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

倪蛟著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南京大学出

倪蛟著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

大学与现代中国
◎ 主编 朱庆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 / 倪蛟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

(大学与现代中国 / 朱庆葆主编)

ISBN 978-7-305-18015-6

I. ①抗… II. ①倪… III. ①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生活—1937—1945 IV. ①G649.28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66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大学与现代中国

书 名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

著 者 倪 蛟

责任编辑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229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8015-6

定 价 6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朱庆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化和殖民化,大学在全世界迅速扩展。著名的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将这一进程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①。是否是“凯旋”姑且不论,但大学的扩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源远流长。远者如起源于汉代的太学,鼎盛时期东汉太学生多达三万;近者如宋元以来的书院,讲学之风兴盛,一时蔚为风气。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出现,至今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梅贻琦便曾指出:“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②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历程中,大学以及活跃于大学场域的社会群体,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而且触及政治的更替、民族的救亡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首先,大学是推动中国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的中心。从根本上

① [加]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② 梅贻琦:《中国人的教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来说,大学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性组织,并以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本职。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① 强调的就是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组织特征。近代以来,在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如何构建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知识体系,推动中华的文化重建,是大学不可替代的历史责任。罗家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② 并把追求学术独立作为新清华的使命。胡适在 1915 年留学美国时也说:“中国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学术独立和文化重建,是百余年来大学孜孜以求的理想。^③

其次,大学成为新兴知识分子汇聚的舞台和社会流动的新阶梯。随着科举的废除和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这种新兴的学术机构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场域。知识阶层在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学术成为一门职业,使他们在大学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致力于构建“学术社会”的努力。而对于有着数千年以读书为进身之阶传统的中国社会,“上大学”也成为各个阶层谋求改变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大学成为社会晋升阶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大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者和国家建设的担负者。大学还深度介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国家建设之中。大学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并有着致力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时代担当,屡屡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所谓“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④,大学因其特殊地位和知识阶层汇聚的特征,成为近代政党鼓吹主义、发展组织、吸纳成员的重要场域。使得每一次政治变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②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台北“国史馆”,1988年,第18页。

③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

④ 刘伯明:《论学风》,《学衡》1923年第16期。

动,都在大学有着相应的呈现。同时大学作为国家培育人才之地,又是国家建设的砥柱中流。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应对政府的意志和需求,也深刻体现在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之中。

最后,大学是推动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先驱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国难深重的时代环境中,大学体现出了沉毅的勇气和担当的精神,成为民族救亡的先驱。这不仅仅体现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这些重大的爱国事件,也表现为大学为推动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在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是时代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进步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的大学早已不再是那种潜心于学术创获的“象牙之塔”,其“担负”是如此沉重,乃至难以承受。这也使得人人都在评论大学,但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缠中难得要领。

在大学与外界复杂的互动中,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在民国时期曾存在为数不少的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但公立大学是现代中国大学的主体。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大学受国家政治变动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而大学对外界政治的反应和参与也显得积极且主动,卷入的程度也更为深切。大学与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现代中国大学场域的运作和交互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在现代中国,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和社会栋梁之所,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过:“后十年国家的时事就是现在大学教育的反映,现在的大学教育好,将来的情形也就会好,现在的大学教育坏,将来的情形也就会

坏。”^①国家的命运和大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自于大学，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知识训练、选择的政治立场和养成的文化主张，都深刻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和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则显得直接且强烈。现代中国的大学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紧密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性知识生产的需要。国家意志和政府需求深刻影响着，乃至主导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大学生产什么样的知识，怎样生产知识，培养何种人才，都紧密围绕国家的目标展开。这既有权力对知识的引导，也有大学对国家需求的主动适应。急国家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所谓“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对大学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论是清末的忠君尊孔，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民主义教育，抑或是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都把大学视为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主要场域。通过引导、规范乃至钳制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国家意志和党派观念对于大学学术自由和创造性的知识生产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从宏观上来讲，该丛书的主旨有两个。

第一，以大学作为观察和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曾说过，大学“是时代的表现”，它“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②。大学不是抽象的概念、结构和组织，大学是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体现。对于大学的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②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研究不能局限于大学本身,而要把它置于周遭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之中,来展示大学对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都在大学接受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政治主张、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大学中形成。通过培育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学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解,难以绕开大学。不理解大学,不理解大学培养的社会精英,不理解大学在知识生产、社会流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就很难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动给予深层次的阐释和解读。

第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道路提供鉴戒。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民族文化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这既需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更需要有本土情怀,继承现代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丰厚历史遗产。作为一种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学要植根中国大地,才能生根成长、枝繁叶茂。如何形成自身的大学理念、大学模式和学术文化传统,如何处理大学与国家、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有着卓有成效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当然也有教训。这些在今天都需要给予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并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加以采择。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①所遗传的是大学对于知识创获和文化遗产的一贯责任,而面对的则是变动的历史环境和互异的文化土壤。希望“大学与现代中国”丛书能以大学作为切入点,加深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加深对于大学的理解,加深对于现代中国大学的理解。

^① 杨东平编:《大学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央大学内迁重庆	14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的中央大学	14
第二节 抗战爆发与中大内迁	28
第三节 内迁后的中大校区	39
第二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学习状况	48
第一节 战时的“平时教育”方针与课程设置	48
第二节 院系设置与教学概况	57
第三节 求学态度和学习兴趣	64
第三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上)	78
第一节 社团活动	79
第二节 宿舍生活	89
第三节 半军事化生活	96
第四节 跑警报	104
第四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日常生活(下)	113
第五节 举办壁报	113
第六节 观赏电影及话剧	120
第七节 听演讲会	125
第八节 体育活动	140
第九节 泡茶馆	147

第五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经济状况	156
第一节 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及心理状态	156
第二节 大学费用与救济制度	173
第三节 日常消费、生活压力与生存之道	184
第六章 战时中央大学学生的民族意识与政治倾向	196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抗日救亡活动	197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中大的活动影响	204
第三节 国民党和三青团对中大的渗透控制	213
结 语	222
第一节 战争震荡与自我调适:学生生活的“战时化”与“平时化”	222
第二节 私域生活与学术空间:“泛政治化”的大学校园	228
第三节 “不平静”与“平静”:抗战烽火中的大学与大学生	232
附 录	240
第一节 中央大学学生生活调查表	240
第二节 中央大学学生生活调查表统计(录入版)	243
参考文献	247
索 引	257

图表目录

表 1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培养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入选两院院士人员名单	73
表 2	中央大学学术社团一览(1944 年 6 月)	80
表 3	中央大学壁报介绍(1944 年 2 月)	114
表 4	在中央大学举办的沙磁区学术讲演会名录	127
表 5	中大、重大、南开中学的体育设施情况(1942 年 9 月)	141
表 6	重庆市田径最高纪录(1945 年 6 月)	145
表 7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籍贯构成	159
表 8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家长的职业情况	160
表 9	1941—1944 年间中大学生的家庭遭受损失状况	163
表 10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家庭遭受损失情况	164
表 11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经济来源总额均值及构成比例	167
表 12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经济支配状况(均值)	168
表 13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经济支配总额均值及其构成比例	168
表 14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回溯过去一年内的收支平衡状况	169
表 15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入学后不久、过去一年内的家庭经济情形与收支状况关系	170

表 16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形与烦闷相关程度	172
表 17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收支平衡状况与精神状态的关系	172
表 18	国立中央大学贷金生与自费生人数比较表(1941 年 2 月)	177
表 19	中央大学奖学金一览(1944 年 10 月)	180
图 1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161
图 2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家长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	162
图 3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籍贯与家庭遭受损失状况	164
图 4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的经济来源状况	166
图 5	1941—1944 级中大学生因何种问题感到烦闷的情况	171

绪 论

(一)

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问题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相互交织、不断激化。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肩负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与西方大学的产生和演进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情境与发展路径。^①概言之,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时,其与国家、民族存有天然的共生关系。在这方面,近代国立大学更是如此。在诞生之时及此后发展进程中,近代国立大学伴随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命运走过不同寻常、颠沛流离的曲折历程。

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民族境况和社会时代环境息息相关,而其也是国家民族命运和社会历史演进的缩影和折射点。特

^① 从目前学界研究情况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历时百余年这一观点,逐步被更多学者所认同。应当说,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历史境地,其发展伴随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这与西方大学诞生发展存有不同的生成因素和历史路径。青年学者牛力认为,“西方大学是从中世纪自治性的学者社团组织发展而来。而在战乱频仍、国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大学首先担负着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它们和民族、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为民族生存和国家富强做贡献,是中国大学难以回避的时代责任。中国近代大学在保存了西方大学基本组织结构和特征的基础上,受到国家意志和政治需求的影响尤为强烈。而大学也积极参与到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中,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存亡始终给予密切关注,正所谓是‘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引自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学的‘中国经验’”。(见其《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引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别在晚清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大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机构,要担负起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使命,而其根本职责是要肩负起民族救亡、国家强盛的历史重任。一方面,中国近代大学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其办学发展和转向受到外在的介入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其使命和责任早已突破“象牙塔”,主动或被动追随外界的各种诉求,并向着更广泛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多样需求延伸扩展。大学对外界的参与和回应,为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提供了良好的视角。正因如此,考察研究中国近代大学尤其国立大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且不再局限于教育史的研究范畴,而常被纳入宏大的历史视野,作为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切入点。应当说,以大学的视角来考察分析近代中国的发展变迁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不过,此类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而缺乏微观层面的应有关照。作为一种补充和尝试,本书力图以微观视野探讨大学,尤其是关注学生群体,从宏观研究范式转向微观叙事探究,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取向”,尝试“回归”历史视域,找寻“微小的声音”。当然,本书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会充分关注宏观的历史变迁。这种转换和切变,绝非本书刻意为之,更非创新之举,而是受当代史学研究趋势的启示。对此,恰如有论者所言:

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不再轻信历史只是一个大写的单数(History),而认为可能会是无数个小写的复数(histories),即利奥塔(Lyotard)所说的“小叙述”(little narrative)逐渐逃离了“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整体化的牢笼(利奥塔,1997)。人们开始放弃对普遍性规律和结构性变化的探求,甚至把这种努力斥为一种可望不可即“高贵的梦想”,而将更多的眼光投注到普通男女的

日常生活。^①

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而言是要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所以研究大学史就必须考察身处其中的各色人等,其中就包含学生群体。大学的历史由无数个“大学人”所建构和塑造,“大学人”的活动和记忆本身就构成大学史。著名学者季羨林在《梦萦未名湖》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值得研究大学史者用心体会。他说道,“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②

考察大学历史自然要关注学生群体,其中必然包含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诸多琐事,但也不能就此陷入“碎片化”的研究路径而呈现支离破碎、鸡毛蒜皮式的日常性描述。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绝不能指向“碎片化”的历史。有论者认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野心是“希望透过新领域的建构来挑战过去的研究典范,突破原有方法论的限制”,“尝试对主流叙述有所补充或修正”。具体而言就是,“如果我们不只将日常生活的内容当作佐证论点的材料,而是一种帮助我们提问的分析工具,则日常生活史料便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典范,不但有助于提出新问题,更能使我们重新反省既有的研究架构”。^③

选择国立中央大学作为本书的考察对象,绝非要树立典型代表,更恰当的说法是将其作为“非典型性”案例,对中国大学史研究尤其是对有关中大的研究进行补充和修正。当然,“非典型性”案例并不

① 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23页。

② 季羨林:《梦萦未名湖(代序)》,收入北大校刊编辑部编《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③ 连玲玲:《典范抑或危机?“日常生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应用及其问题》,《新史学》,2006年第17卷第4期。

排斥其中蕴含的“普遍性”价值。抗战时期,中大及其学生群体的境遇状况折射出大后方大学的发展处境和大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是大后方中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历史缩影。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当时东南大学也在风云际会之中合组九校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为首都南京的最高学府,但随之却陷入学潮动荡。罗家伦接掌校长后,校园秩序才得以逐渐恢复,进而中大迈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抗战爆发之初,中大顺利而较为完整地搬迁至重庆等地,中大学生由此也开启战时环境下的大学生活。^①本书选择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1937—1945)作为研究主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与和平时代不同,战时环境下中大的学生生活有着独特而鲜明的历史印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日必有一战”的时局为包括中大学生在内的许多国人所认知和警醒,但这只是氛围感受和心里预设。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真实且直接的战争影响极大波及原本正常的大学生活,中大学生的求学环境和生活状态就此改变。如此转变是由特定的历史境遇所决定和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使得当时中大学生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大学体验,也成就中大校史中重要的历史篇章。然而,对这一历史时段的现有论述研究相对缺乏,此为撰写本书的初衷,以期反映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进而呈现民国时期大学和大学生活的“另类图景”。

第二,关于抗战时期大学的研究,大多着眼点于大学与政府、民族主义运动以及政党活动等关系的研究范畴,选择考察的内容也大多为“宏大叙事”,而对学生群体关注不够,或者仅作为一个侧面。当然,“宏大叙事”的研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作为大学主体之一的学生群体,理应包含在大学研究的范畴之内。更进一步地说,有关

^① 本书所论及的是内迁陪都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而非汪伪政府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大学。关于当时沦陷区的中央大学相关情况,参见《南京大学百年史》中的第五章《沦陷区的南京中央大学》。该书由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54页。

“宏大叙事”的研究探讨不应脱离对学生群体的关注。在这方面,对于战时中大的研究亦当如此。校方、政府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和政党纷争等各方的介入影响,其重要的关注点和投射点均在于中大学生群体。这些影响并非“单向度”的灌输,而应是“双向度”的互动。战时中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可以反映这些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对这一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研究不应为简单化、整体化的历史建构,而要更多体现微观层面、真实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也让当时国人陷入深重苦难。毋庸置疑,战时烙印深深镌刻于彼时国人生活之中,即使身处最高学府的中大学生群体也概莫能外。以此论之,中大学生的战时生活,也反映和体现抗战时期国人生活状况。因此,研究考察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不仅对补充和完善中大校史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充分反映和展示国人抗战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

学术研究没有终点,应是永无止境的探究历程。但学术研究有起点,自当站在先贤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展开新的探索。故而,梳理和检讨学术史既是要向前人表示敬意,而且也是对本书研究予以恰当定位,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寻找重要启示,以期在一定层面或某些方面上取得突破。截至目前,有关中国近代大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为聚焦研究主题,本书只能挂一漏万,仅就与主题有关联的研究成果予以简约性梳理。

美籍华裔学者叶文心所著《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是其在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叶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